



● 作者/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 譯者/章昌文 ● 審者/劉宗翰

中共未來動向

The Once and Future Superpower: Why China Won't Overtake the United States

取材/2016年5-6月外交事務雙月刊(*Foreign Affairs*, May-June/2016)

對許多人而言，問題不在中共是
否會成為超級強權，而是時間
的問題。(Source: AP/達志)



美國經濟優勢雖已滑落，但仍具壓倒性軍事優勢。中共無論是在科技、研發，甚至全球的結盟體系，都還遠不及美國。鑑此，中共要超越美國成為世界超級強權，依然長路漫漫。



在經過二十五年之後，作為世界唯一超級強權的美國是否已走到了盡頭？許多人均認同以下觀點，眼見一個崛起的中共即將趕上、甚至再過不久就會超越美國。畢竟，藉由諸多措施，中共的經濟已經步上軌道，即使其成長趨緩，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而且勝過美國經濟許多年。由於資金充裕，使北京得以運用新的財富招徠朋友、嚇阻敵人、進行軍隊現代化，以及積極維護周邊主權聲索。因此，對許多人來說，問題不在中共是否、而是有多快會變成超級強權。

但這是一廂情願、抑或杞人憂天的想法，經濟成長已不再和以前一樣能直接轉變成軍事實力，這意味著興起強權的崛起，以及既有強權的衰落，這種轉變會比以前更加困難。而中共——唯一具備原始潛能，可變成美國真正的全球勁敵——由於科技遠遠落後，與先前崛起國家相較，面臨的挑戰也就更為艱鉅。即便美國的經濟主宰力已從巔峰下滑，但其尚未喪失軍事優勢，且遍布全球、構成現有自由世界國際秩序核心的聯盟架構仍在（除非華府輕率決定棄而不用）。與其寄望國際政治中的權力轉移，每個人都應開始習慣，未來數十年，美國依舊會是這個世界唯一的超級強權。



即便美國經濟主宰力已從巔峰下滑，但其尚未喪失軍事優勢。(Source: USN/Dylan McCord)

持續優勢將可幫助美國避開最大的傳統國際危險——世界主要強權間的戰爭。這雖讓華府能有多種方式處理諸如恐怖主義的非國家威脅、氣候變遷的跨國挑戰，但尤其在財政日益拮据下，上述情事也使美國必須肩負起領導重責，須在優先處理的事務中做出選擇。常言道，能力愈強，責任愈重，要成功扮演領導角色，華府將需要展現出美國外交政策向來欠缺的成熟度。

國家財富

在預言中共未來的強權地位時，多數人重視的是其迫切內部挑戰：趨緩經濟、環境污染、普遍的貪腐、危機四伏的金融市場、付諸闕如的社會安全網、急速老化的人口，以及焦躁難安的中產階級。即便這些問題有害，但在世界舞臺上，中共真正的罩門並不在此，而是其相較美國偏低的科技專業水準，相對於過去崛起的強權，中共與領先強國間要拉近的科技落

差更大。中共或許出口了一個又一個裝著高科技貨品的貨櫃，但在一個全球化生產的世界，這並無多大意義。中共的出口，半數是由經濟學者所稱的「加工貿易」組成，意即零組件是輸入中共組裝，組裝完後再行出口。況且絕大多數這些中共出口的貨品，並非由中國大陸公司、而是由更多已開發國家的公司所掌管。

一旦用更能反映國家專業知識源頭的科技實力來仔細衡

量，中共的真正地位也就一清二楚了。例如，世界銀行付費使用智慧財產權的資料顯示，美國確實是創新技術的首要來源，2013年就有足以傲人的1,280億美元收入——超過位居第二順位的日本達四倍之多。相形之下，中共則是大規模進口技術，而在2013年的智慧財產權使用獲益卻不到10億美元。另一個科技落差的優質指標，就是那些在美國、歐洲、和日本同時申請註冊的「三方專利」(triadic patents)數目。2012年，有將近1萬4,000件這類專利源起於美國，相較之下，屬於中共的只有不到2,000件。在科學和工程上具高度影響力的文章分佈——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用來衡量那些位居前百分之一被引用的文章——也顯示出同樣情況，美國幾乎佔了這些文章的半數，是中共被引述文章的八倍之多。從獲得物理、化學，以及生理或醫學諾貝爾獎的詳細數字亦凸顯出此種趨勢。自1990年

迄今，主要在美國從事研究而獲獎的人有114位，而在中國大陸研究獲獎的人只有兩位。

正因中共與美國的經濟型態如此不同，作為刺激權力轉移預期衡量標準的國內生產毛額，卻大幅低估了兩者之間真實的經濟落差。一則，中共目前對其環境造成鉅大破壞，以換取有利於國內生產毛額的計算，即便這會縮減壽期、增加清理與醫療保健的開銷，而且隨著時間推移將削弱經濟能力，也在所不惜。再則，國內生產毛額原本是用來衡量二十世紀中期的製造業經濟，所以一國的生產愈以知識、全球化取向，其國內生產毛額就愈會低估其經濟的真實規模。

聯合國公布的一份新統計數字顯示，國內生產毛額誇大了中共相對實力的程度。而稱之為「包容性財富」(inclusive wealth)的這項衡量指標，代表了經濟學者截至目前在計算一國財富上最系統化的作為。正如一份聯合國報告所闡明的，它

是從三個領域來計算一國的資產儲備：「(1)製造資本(道路、建築、機器和裝備)，(2)人力資本(技能、教育、健康)，(3)自然資本(底層土壤資源、生態系統、大氣層)。」三項加總，美國的包容性財富達到近144兆美元，是中共包容性財富32兆美元的4.5倍。

相較於美國經濟的真正規模，中共經濟或許介於國內生產毛額和包容性財富所提供的數字之間，後面的衡量指標當



中共人口老化及實行一胎化政策的後遺症，僅是其所面對之部分內部挑戰。(Source: REUTERS/達志)



中國大陸境內的环境污染，諸如霾害，已經影響到人民的健康。(Source: AP/達志)

然不像國內生產毛額一樣受到相同程度的檢視。然而，國內生產毛額的問題，在於它衡量的是流量(通常是一年中生產的商品和服務價值)，而包容性財富則是檢測存量。正如《經濟學人》雜誌所言，「用國內生產毛額來測算一國經濟，就像是用季利潤來評斷一家公司，卻不去看其資產負債表一般。」因為包容性財富是用來衡量一個政府相信可供動用來達成其戰略目標的共用資源，而在考量地緣政治競爭時，這會是個更有用的量度標準。

但無論人們如何比較美「中」的規模經濟，美國顯然更有能

力將其資源轉變為軍事實力。從前，崛起中國家擁有的科技實力與那些領先國家相去不遠。例如，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美國與英國的科技水準相近；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德國與昔日協約國的差距也有限；冷戰初期的蘇聯和美國相較，在科技上亦不算落後。這意味著當這些挑戰者在經濟上崛起時，他們可很快就對首要強權形成嚴重的軍事挑戰。然而，中共目前在科技上的相對落後，卻意味著即使其經濟持續獲得進展，但在軍事上要與美國並駕齊驅，成為真正的全球戰略匹敵者，而非僅是在自家周邊

稱雄，這絕非易事。

中共僅擁有巨大的經濟體並無法成為世界第二超強。

資格限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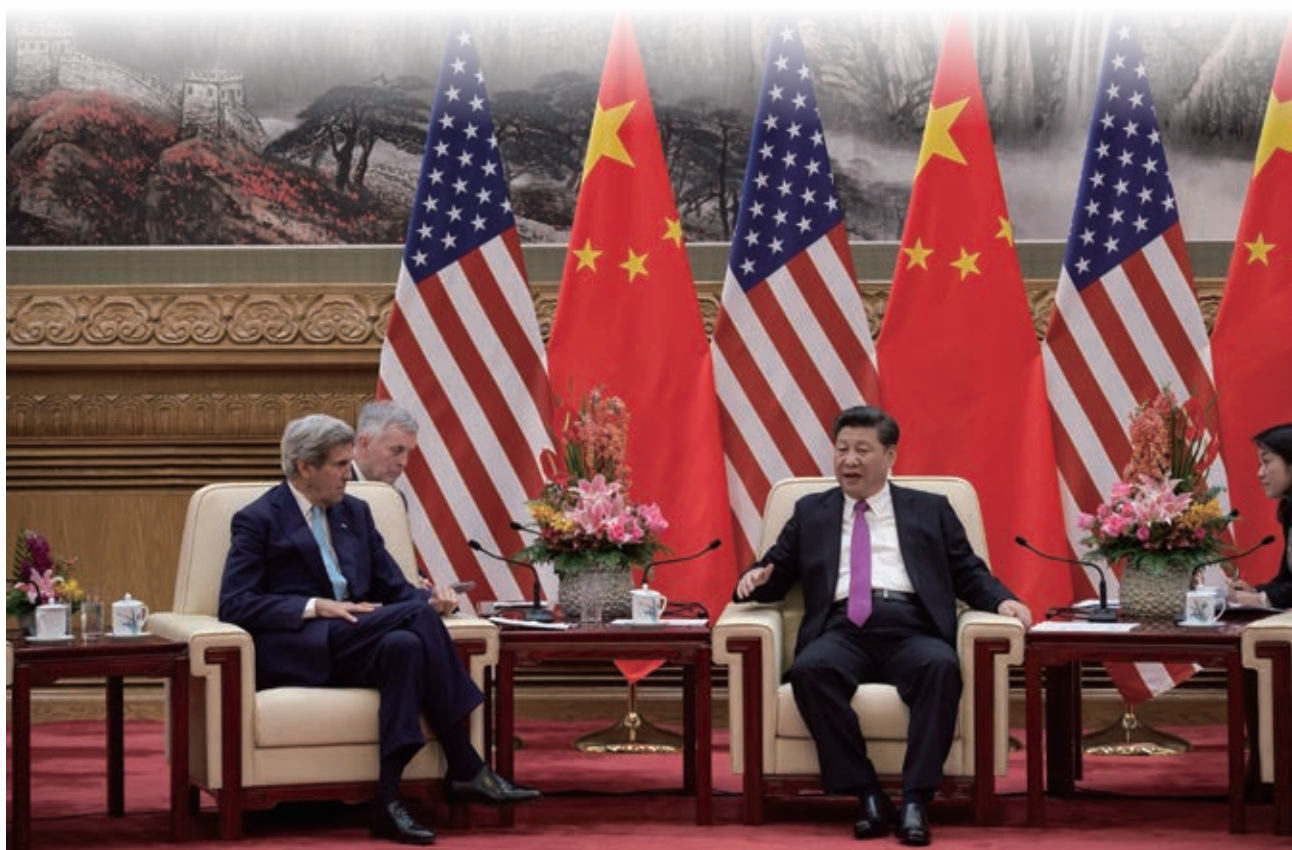
如果美國單靠在鄰近地區動武的能力，就能取得超級強權地位，那麼中共和美國間在科技與經濟上的差異就沒有太大關係。但是造就美國成為超級強權，是其在全球行動的能力，而那種能力的門檻極高。它意味著要擁有政治學者波森(Barry Posen)所稱的「全球公域掌控力」(command of the commons)——亦即擁有對空中、太空和開放海域的控制，以及用來掌控這些領域的必要基礎設施。當人們衡量形成這種能力的14種系統時(從核子攻擊潛艇到衛星、再到運輸機，無所不包)，美國在各個領域的壓倒性優勢也就清楚可現，這是數十年來多方面進步的成果。對中共來說，要接近美國在這些領域中任何一項實力，都可能花費極漫長的光陰，遑論要在所有領域了。

一方面，美國已建立起厚實的科學和工業基礎，中共雖正快速地拓展其技術輸入，增加其研發支出，以及擁有科學與工程學位的畢業生數量。但在這類事務上，任何國家能進展多快自有其限度，更何況中共的方式還存有多重障礙——例如缺乏有效的智慧財產權保護、效率低落的資本分配方式——鑑於其政治體制僵化，變革會極

其困難。雪上加霜的是，中共追趕的是個變動目標。2012年，美國在軍事研發上的花費是790億美元，這一數字超過中共估計總數的13倍，即便中共進步再神速，或許仍不足以拉近差距。

再者，美國已耗費數十年光陰來籌獲先進武器系統，與時推移下，這些系統變得愈發複雜。1960年代，研製飛機約需時

五年，但到了1990年代，隨著零件和線路碼的數目急劇增加，這個數字持續增加到了十年。現今，設計並製造最先進的戰鬥機，要花費15到20年的時間，軍用衛星甚至耗時更長。因此，他國即便設法建立起科學和工業基礎，來發展那些賦予美國全球公域掌控力的諸多類型武器，到其能真正擁有那些武器，也早就不知今夕何夕，甚至連中



美「中」戰略與經濟對話是雙方討論分歧的高層管道。圖為第八屆對話結束後，中共主席習近平與美國國務卿凱瑞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交談的情景。(Source: REUTERS/達志)



共國防規劃者都意識到這項挑戰的規模。

全球公域掌控力亦需要有監督各種巨型國防專案的能力，儘管人們對軍工複合體的惡行、和五角大廈中的「浪費、作偽和濫權」有各種非議，但美國的研究實驗室、承包商及官僚，在過去數十年專心執志所獲取的這種專業知識，卻是中共依舊欠缺的。這種「從做中學」的經驗屬於組織而非個人，只能經由示範和教導來傳授，所以網路竊取或其他形式的諜報活動，並非是有效的獲取捷徑。

中共的國防工業仍處萌芽階段，正如學者畢辛格(Richard Bitzinger)及其同僚所主張，「除彈道飛彈等少數幾項技術卓有成就外，在設計和生產相對先進的傳統武器系統上，中共的軍工複合體並未展現出有多大能耐。」例如，儘管已投入極大資源努力嘗試，但中共依舊無法大量生產高性能的飛機發動機，只能轉而倚賴俄國的次等產品。在其他領域，北京甚至無意與人競爭，就以水下作戰來說，中共在反潛作戰方面裝備拙劣，也甚少做出改進。直到近期，中共才有能力生產核子

動力攻擊潛艦，其靜肅性僅能與1950年代服役於美海軍的潛艦相提並論。然而，在那之後，美國政府卻已投資數千億美元、耗費六十年光陰，用於製造當代達到完全靜肅水準的維吉尼亞級潛艦。

最後，還必須有一套非常特別的技能 and 基礎設施，才能讓所有的武器真正派上用場。部署運用軍事資產並不容易，因為不只武器本身往往極其複雜，且常需要以協同方式來使用。例如，部署一支航艦戰鬥群，就是個相當複雜的任務；許多配屬的船艦和飛機必須即時協作。即使是那種看似簡單的系統，想真正發揮功效，也需要複雜的外圍架構。以無人機為例，只有當一支軍隊擁有訓練有素的人員去操作它們，且具備快速搜集、處理所獲資訊並據以行動的技術和組織能力，才可發揮最大效用。發展必要基礎設施以謀求全球公域的掌控能力，不論任何一支軍隊都得耗費極長時間。況且由於此等任務高度重視彈性和授權，而中共屬於中央集權且階層分明的部隊，特別與之格格不入。



就現今科技而言，設計並生產最先進的戰機，須耗費十多年的光陰。(Source: USAF/Samuel King Jr.)



中共除了在研製彈道飛彈上略有成果外，在其他相對先進的傳統武器上，並未能交出漂亮成績單。圖為東風26型彈道飛彈。(Source: REUTERS/達志)

傳統的權力轉移觀點必然不適用於當前情勢分析。

這次真的不一樣了

只有在1930年代，日本曾擺脫嚴重衰退，並且蛻變成一個狂暴的軍事機器；德國從被解除武裝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輸家，轉而成為有能力征服歐洲的一方之霸；而蘇聯則從戰爭和革命中復甦，變成難以對付的陸上強權。其後十年，世人見證了美國一枝獨秀的異軍突起，從軍事上的落後者變成全球的超

級強權，緊隨其後的只剩一個具核武的蘇聯。今日，鮮少有人會認真預判另一場世界大戰、甚至是另一個冷戰，但很多觀察家卻認為，從這些過去經驗顯示出，一國有多快試圖將其經濟力擴張成為軍力，其就會多快變成禍害。

但目前所發生的情況，並非傳統所認知的那種權力轉移，人們可討論中共是否很快就能達到，從強權到超級強權之路的首個重要里程碑：取得所需的經濟資源。但是單單一個巨型經濟體，並不會使中共變成世界第二個超級強權，其亦無

法克服另一個巨大障礙，即取得所需的科技能力。在那之後存在的挑戰，是要將這份潛在力量轉換成可供全球兵力投射的各類系統，還要學習如何運用它們。各個步驟都將耗日費時，困難重重。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中共將會在強權與超級強權之間繼續徘徊。你或許會稱它為「崛起中的潛在超強」：拜其經濟成長之賜，中共已從強權之列脫穎而出，但在其取得可能成為超級強權的經濟和科技能力前，依然是漫漫長路。

另外，還有一項不利於中共邁向超級強權地位的要素：做出必要犧牲的誘因薄弱。美國軍力能夠無遠弗屆，正是受冷戰生死攸關的影響，若非該國決策者面對要制衡蘇聯可能成為主宰歐亞之超級強國的挑戰，絕不會承擔起這個重責大任。（其實這並不令人訝異，在蘇聯瓦解二十五年過後，俄羅斯仍擁有世界第二強的軍力。）今日，中共並未遭遇類似冷戰那種使美國在軍事上做這麼多投資的壓力。美國是個威脅遠不及蘇聯的超級強權：無論中



共決策者認為美國外交政策有多麼使人不滿，都不可能達到在冷戰期間激起華府恐懼的那種程度。

對中共甚至更為不利的是，美國一向以其盟友網絡為傲，幾乎沒有誘因使其放棄對此一體系的掌控。美國的盟邦清單，讀來就像世界最先進經濟體的風雲榜，這些夥伴也減低了維繫美國超級強權地位的代價。美國國防開支在1990年代末期約佔國內生產毛額的百分之三，其後十年，由於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增加到了百分之五左右，現在又已降到接近百分之三。華府能夠以相對較少的付出維繫其全球軍力，部分要歸功於其盟友提供的基地，以及渠等協助共同研發頂尖武器。中共唯一堅定的盟友是北韓，但這個麻煩鬼經常幫的是倒忙。

鑑於重重障礙阻擋了中共通往超級強權之路，且克服障礙的誘因甚微，國際體系的未來幾乎取決於美國是否繼續承擔更顯次要的責任，即維持華府和其他國家稱為「深入交往」(deep engagement)的全球大戰略，而這種戰略美國已遵循了近七十年。除了偶爾改變心意，導致美國否認本身全球角色地位之外(別太擔心，這些政治化指控有時是針對已經做過的事)，華府對於核心軍力維持、聯盟維繫、關鍵區域保護、全球經濟支撐，以及促進跨國問題上合作的承諾，在往後數十年，仍將居於有利地位。

尤其從美國近年在外交表現不佳的情況看來，並不容易察覺此種大戰略的利益，諸如入侵伊拉克這樣的尷尬結局，就赤裸裸地提醒華府，使用武力去改變海外他國內政的難處。然而，強權既

要拚命避免不利結果，也得努力塑造有利局面，而華府在這方面的成效卓著，遠超過大部分美國人的理解。

對一個引領世界體系並令大多數國家滿意的強國來說，具有足夠力量嚇阻或阻擋挑戰者，其實會比在邊緣地帶進一步改善其地位更具價值。數十年來，美國大戰略的一個關鍵目標，就是在避免出現一個更為危險的世界，而美國在此作為上的表現，主要可用在歷史上常見卻的結局未定論(absence of outcomes)：重要區域因嚴重的安全困境而動盪不安；盟友分崩離析而不能圍堵突圍的挑戰者；快速的武器擴散；強權間的軍備競賽；和陷入經濟或軍事陣營的競逐。

華府如果真的撒手不管世事，必會出現更多這類挑戰，而跨國威脅可能會比目前更加顯著。即便這樣的威脅並未增加，如果美國同時還要設法對付更不穩定的全球秩序，處理威脅的任務將會變得無比艱難。美國目前要其盟友通力合作來對付跨國挑戰，有時候並不容易，但如果像目前愈來愈多的分析家和決策者——還有為數眾多的民眾——所言，要美國放棄其領導角色，縮手自掃門前雪，但要這麼做談何容易。

**一個保有美國軍事優勢與經濟掌控力
下滑的世界，將能檢驗華府的能耐。**

不陷入誘惑

自蘇聯瓦解迄今，美國勝過其他國家的顯著實力優勢，都伴隨著自我傷害的風險，就像對伊拉克開戰一樣。但是美國經濟地位的下滑，迫使美

國領導者專注國家大戰略的核心任務、而不去捲入糾葛不清的周邊衝突，或許稱得上是因禍得福吧。實際上，這的確是支撐歐巴馬總統外交政策的指導邏輯。儘管如此，一個持續擁有軍事優勢和經濟力衰退的美國世界，將以四種主要方式，持續檢視著美國的承受力。

首先是為了追求自我獲益而脅迫或利用盟友的誘惑。美國盟友會以許多方式依賴華府，美國也靠這些盟友的支持作為回報——無論是贊同美國的爭議性政策、避免美國反對的活動、或同意雙方互惠交易中的不平等條件——一些似乎只有不明智者才會放棄的事。（想想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Donald Trump]所經常宣稱的，美國在與外國人——包括其關鍵盟邦——打交道時總是蒙受損失，而他將重振美國獲勝的能力。）但當代國際秩序核心的基本協定是，如果其成員不去追求相對的軍事優勢，而加入一個綿密制度網路，並且同意依共同規則辦事，則美國就不會利用其掌控力自其盟友攫取不當回報。期望華府永不運用其優勢

地位謀求更好的交易，應屬過分要求，而包括甘迺迪(John F. Kennedy)、雷根(Ronald Reagan)、小布希(George W. Bush)和歐巴馬在內的多位總統，在不同歷史時刻都曾這麼做過。但華府若太常憑藉其勢力來實現狹隘的自我獲益，而非用來保護或提升整個體系，它將會遭受削弱其領導地位和現有秩序正當性的真實風險。

其次，當其他對手——也就是中共——在世界舞臺上使用日漸增長的經濟影響力時，美國就會愈來愈受到過度反應的鼓動，包括德國、日本及蘇聯等近期多數崛起的重要強國，都是軍事力勝過經濟力。相較之下，中共將有數十年時間是經濟力大於軍事力。由於軍事挑戰對全球秩序而言很快就變得凶險萬狀，所以這是件好事，但它也意味著中共將會轉而逐步增加經濟的挑戰，而這將需要明智以對。中共按照此方式的多數作為，將可能只會輕微、或只在表面上撩動現有秩序，這對提升北京威望很重要，但不會對秩序的基本協議或原則造成威脅。華府理當有雅量地回應這

些事情，體認到付出適當代價將北京納入此架構中，將比冒險引發對整個架構更根本的挑戰要可取得多。

近期對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AIIB)的爭執，就是一個避免舉止失當的好案例，中共在2013年提議設置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作為提升其地位和提供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的方式。儘管其放貸標準或許會較預期的稍欠建設性，但這不太可能會造成區域的重大傷害、或動搖全球的經濟架構。而美國以發動一場公共外交作為回應，勸阻其盟友加入，渠等卻對美國的反對相應不理，競相加入。對相當具建設性的中共方案、和其盟友的參與其中，都本能加以反對，華府發動了一場不必要的零和作戰，卻是以羞辱的外交失敗告終。（於此同時，由於美國國會未能依協議通過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甚至造成了更大的挫敗，使其他國家嚴重質疑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

第三，美國仍將面對伴隨權



力而來的誘惑，去干預與其核心國家利益無關之處（或擴張國家核心利益的定義，到最後卻落得空洞乙詞）。這個誘惑可存在超級強權的鬥爭當中——冷戰期間，美國陷入越戰的泥淖，而蘇聯也同樣陷在阿富汗——而在已無人可與美國匹敵的今日，顯然依舊存有誘惑。歐巴馬小心翼翼地防範此一誘惑，其因為將「不做蠢事」提升成大戰略箴言而飽受批評，但若是做蠢事會危害到美國維持大戰略及與此相關的全球駐軍能力，那麼他當然言之有理。雖然上述還遺漏了「將心思放在要事上」的必然結論。而在近七十年的時光中，也意味著要延續華府的核心任務，促成關鍵區域穩定，和保持全球經濟與更大範圍秩序的活絡。

最後，即使當核心利益受損，像是中共對其周遭地帶立場日益強硬，華府將需避免採取過於挑釁的軍事態勢。的確，北京的「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大幅增加了美國操作飛機和水面艦艇（但不含潛艦）靠近中共的成本與風險。然而，美國究竟應如何回應北京新取得的區域軍力，端視華府的戰略目標為何而定。要重獲美國在整個1990年代具非凡影響力期間所享有的全部軍事行動自由，確實是件難事，且必要行動亦會增加將來對峙的風險。但若華府的目標更為有限——只在確保區域盟友和維持一個有利的制度和經濟秩序——那麼該挑戰應該是可以掌控的。

例如，儘管中共提升了軍事實力，但透過採用區域拒止戰略，美國依舊能嚇阻中共挑釁並保護盟友。與用在太平洋衝突中備受討論的空海整體戰準則不同，此一作法不會去設想將敵對行動迅速升高到對中共的攻擊。相反的，該構想就是為

了在衝突期間將中共能力限縮在「第一島鏈」（包含部分的日本、菲律賓和中華民國）之內。依照此一戰略，美國及其盟友將會運用與中共用來驅逐美國水面艦艇和飛機離開其海岸的相同混合戰力，諸如水雷、機動攻船飛彈。而這有可能改變局勢，迫使中共在其依舊極其脆弱的一些領域——尤其是水下作戰——競逐。

這樣一套戰略的前提是，中共即使能阻止美國的水面部隊和飛機通往靠近其海岸區域，也無法在衝突中使用該空間做為通往更遠地區投射兵力的發射場。在此想定中，中共的近岸水域會變成近似無人的海域，任何國家都不能在此大量使用水面艦艇或飛機。這種情況會與美國佔盡上風的1990年代有天壤之別，當時中共還無力阻擋世界領先的軍事力量，在其領土邊界接壤的空域和海洋中自由進出。但有必要正確看待此一改變：在歷經數十年、耗費數百億美元之後，中共已開始扭轉了此一不尋常的弱點，美國雖絕不會自己承認此事，但這卻是意料中的事。

儘管此一區域拒止戰略或有助於解決長期的問題，但對處理迫在眉睫的中共挑戰——在南海人工島上持續構築的軍事設施——卻無多大助益。這並無簡單的解決之道，但華府應避免做出太過挑釁、可能引發衝突的回應。畢竟這些無掩蔽的小島，在衝突中它們幾無防衛可言，按理並不會改變整體的軍事平衡。中共的強勢作為甚至可能會適得其反。2015年，菲律賓——擁有極寶貴基地設施的真正島嶼——歡迎美軍部隊在離開24年之後再度登上其海岸，且美國刻正與澳大利亞協商，設置長程轟炸機的基地。

截至目前，歐巴馬政府選擇執行所謂的自由航行行動，以對抗中共的海上主權宣告，但作為影響該秩序主要發展的領導者，美國還有許多其他利器可用。為了將衝突升高的擔子轉嫁給中共，美國——甚至由其盟友來做更佳——可仿效中共做法，在該區域增加半官方的研究航行。國際法是華府擁有的另一項資產，將領土爭端交由國際法庭仲裁，就是在不斷對中共施壓，假設北京持續反對這麼做，將會喪失其正當性，並可能發現自己成了制裁和其他外交懲罰的對象。如果北京試圖從爭議區域攫取經濟利益，華府就可推動類似比例懲罰策略，這種方式也同樣協助了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運作，由在海牙(Hague)的常設仲裁法庭來裁定中共非法行動的獲益，對中共出口產品徵收臨時關稅，收取正好跟主權聲索判決的相同收益，一旦該案件在國際法庭裁定，便隨即分配那些稅金。無論採用哪種辦法，與美國全球利益攸關的絕非島嶼本身、或是聲索的本質，而是這些挑釁對範圍更廣的秩序所造成的影響。

套用政治學者柯慶生(Thomas Christensen)的話來說，中共雖能「挑起問題又見好就收」，但歸根結柢卻是美國的全球地位使其有了操弄的空間，關鍵在於中共利用守勢的優勢：正如許多戰略思想家所指出的，挑戰穩定現狀極為不易。

認識自我

儘管中共逐步崛起，但美國的超級強權地位卻是更加穩固，並不會受近期一些評論的影響——實際上，這般穩固的態勢，或許只有禍起蕭牆才

會成為世界頂尖強權的首要威脅。隨著美國優勢從二十年前的巔峰稍稍減弱，對著實令人沮喪且難以控管的世界，華府或許會受到引誘而做出過度激烈反應，不是猛烈攻擊、就是撤守返鄉——兩種方式都捨棄了數十年來其大戰略核心中的耐心和建設性途徑。這會是個嚴重錯誤。由於渠等將其主要成就——防止出現一個更不協調的世界——視為理所當然，這套大戰略遠比大多數人所瞭解的要更成功且更具助益。

肯定會為緊縮開支而做出錯誤判斷的方向，就是從事另一場像伊拉克戰爭那樣的災禍。迄今，美國在無損其全球地位下也已挺過了那場災難，正好印證了其超級強權地位有多穩固。但這並不意味著決策者可以一再犯錯而免受懲罰。在一個儘管美國經濟優勢下滑，但仍保有其壓倒性軍事優勢地位的世界，對察覺威脅而過度反應的誘惑將會有增無減——即使要吸收造成錯誤的代價誤差範圍將會縮小。就算在先前的總統大選中有人曾說過甚麼，美國離處在一個極端危險的全球局勢中相距甚遠，但也不能說因為其地位是如此固若金湯，下任總統不負責任的政策就不會造成惡果。

作者簡介

Stephen G. Brooks係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治理學副教授。

William C. Wohlforth係美國達特茅斯學院政府系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教授。

Copyright © 2016, *Foreign Affairs*. Distributed by McClatchy-Tribune Information Services.